

(一)

“出了高铁站，走十几分钟，就是你老家。”县领导告诉我，而且就在今年年底通车。

这话听得我像在梦里一样。我从小就想看火车，尤其是听说把一块铜板往轨道上一放、火车轮碾过就成了一把小刀之后，就更加向往看看火车。

我的家在苏北宝应县城东南方20多里外的一个小村子里，穷乡僻壤，不通汽车，更不用说火车了。那时，交通基本靠走，农民自嘲说“乘11号汽车”——11，即两条腿。

这“11号汽车”偏偏又“动力”不足：我出生于1953年8月，新中国刚诞生不久，正是百废待兴之际，日子刚刚好转一点，我每天饥肠辘辘，长得面黄肌瘦，走路的能耐就可想而知了。

从家里到县城，我要走三四个小时，通常是天不亮起床，妈妈做点吃的，然后上路。有一次上了路，走了几里地，我走不动了，想歇会儿。妈妈不让，拉着我继续走，说是要“赶路”，不然什么时候才能到“街上”。我们那里把县城叫作“街”，去县城叫“上街”。就这样，一路上，妈妈催着要“赶路”，我闹着要“歇脚”，于是，一个怨天怨地，后悔不该带我，一个哭天喊地，坐在路上不肯走。到了县城大姨家，我们都累得站不住了。

我说交通“基本”靠走，是因为也有不走的机会，那就是坐船。农民种田要肥，县城厕所要清，于是生产队包了一个县级机关的厕所，每年交机关几十块钱，厕所满了就用船去把粪便装回来，要是现在是要倒过来给钱的。每逢船要上街，村里如同过年般热闹，想乘船上街的，提前准备起来。开船那天，在家的到河边送上街的，千叮万嘱咐，目送着船慢慢启程。

船的动力就靠竹篙撑，行到大河，执行装粪任务的男子汉上岸拉纤，留一个人在船上掌舵，老人妇女和我们小孩继续坐在船上。等我读到小学高年级，感到坐船享受不好意思



□周文彰

了，就主动要求上岸当纤夫，走不动了再上船。后来，每当响起“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的歌声时，我就特别有画面感，因为“坐船头”“岸上走”的体验我都有。

(二)

又过了不知几年，最让我感到有面子的事，就是街上亲戚到我家。他们两三人一起几辆自行车一下子拥进村里，常常引来围观。渐渐地，“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的理想在城里形成，也向农村蔓延，以自行车当交通工具的多了起来。不过，我1973年9月离开老家到扬州市里读书前，自行车还没有普及。我每次从学校到公社参加教师会议，七八里路，都是光着脚板大步流星地走，早上去，晚上回。当民办教师3年，绝大多数教师都和我一样，基本靠走。

在扬州读书，寒暑假都要回老家。老家到扬州，220公里路程，汽车票好像是26元钱。这路费意味着什么呢？我当民办教师时的补贴是每月5元，外加年终生产队给2000个工分，大约值100元，差不多冲抵生产队分给我家粮草的钱。26元的路费就是我半个月的补贴，当然就是大钱了。因此，往返找顺便车就是常事了。好在一位初中同学在县食品公司工作，公司经常要往扬州肉联厂送猪

禽，我可以坐在卡车驾驶员旁边。要是赶上不发车，我就或者买票，或者遇到什么坐什么。我就乘过一次三轮摩托车，拖斗装着氧气瓶，没有篷布，我就坐在氧气瓶上，经受了一次风寒的洗礼，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有什么危险。

20世纪70年代末，从县城到老家通了汽车。虽然汽车驶过，卷起一路沙尘，但交通靠走的历史算是结束了。从扬州以及后来从南京乘车到县城，不出县汽车站，直接等车去老家，下车就是我们大队境内，走半个小时就到村里了。

车是通了，但车是论班次、论路线的，一天也就开个几趟，要是谁家突然有个急事，照样饱受交通不便之苦。1986年11月，我父亲在老家突发脑溢血，村民们七手八脚把他抬上门板，一路颠簸飞跑几公里，把他送到乡医院，路上还有意识的他，到医院就不省人事了。在北京读书的我，接到“父病危速回”的加急电报，连夜坐10多个小时火车到徐州，从徐州再坐9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宝应县城，真是又焦急又悲伤的漫长煎熬，现在回想起来仍痛苦不堪。我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写道：随着博士论文接近完成，我益发怀念已故的李秀林教授和我的父亲周德荣先生。我得以攻读博士学位，内中饱含着他们的关心与支持。值本文完成之际，我谨向李秀林

教授，一位英年早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表示深沉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我谨以本文作为我对先父的永久纪念——他老人家一生的最后心愿就是盼望活到我戴上博士帽，但突如其来的病魔使他未能了却此愿，留给我一份悲伤的、终生的遗憾。

(三)

交通的跨越式发展，首先表现在也归功于高速公路。自1984年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沈大高速公路开通以后，高速公路在我国广袤大地迅速延伸，通车总里程，1998年位居世界第六，2001年跃居世界第二，2011年就名列世界第一了。2000年11月，京沪高速的全线贯通把我老家宝应带入了高速时代，从徐州到宝应，最多2.5小时。从宝应出口下高速，汽车10分钟就驶进了我们村。乡村公路也从砂石路变成了柏油路或水泥路，而且实现了村村通。

交通的跨越式发展，第二表现在也归功于机场的兴建和民航的发展。我亲身经历过，坐飞机的资格从特定身份转变为普罗大众，买机票的手续从要组织证明到持身份证即可，安检人员从边防战士变为安检职工。我到过全国很多地方，空中航线把它们从偏僻带进了“地球村”和经济“一体化”。2012年5月，扬州泰州机场启

用，从北京或海南直飞扬州，然后开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我老家。

交通的跨越式发展，第三表现在也归功于高铁。当世界上第一条高铁即日本新干线1964年建成运行时，我们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我国铁路步入高速时代的起点，是2003年开通的秦沈客运专线，到2018年底，我国高铁运营里程超过2.9万公里，比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占全球高铁运营里程的2/3以上。当我第一次看到高铁在车站里呼啸而过，我情不自禁地惊叹曰：“狂奔啊！”并随即赋诗一首：

一窜无踪胜箭头，
绿皮自愧似蜗牛。
穿山跨涧平川越，
足迹横空遍九州。

绿皮即过去常坐的客运火车。等我老家高铁开通时，从北京到我们村，也就4个小时。想当年，这点时间，我从村里还没有走到县城呢！

交通的跨越式发展，第四表现在小汽车进入家庭。以往，在我眼里，能坐小汽车的都是大干部，能坐进口车的都是很高级别的干部。1992年我



周立波：永远和人民同甘苦

□耿 娟

周立波于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在《永远和人民同甘苦》的文章中写道：“作为人民的代表，我一定要永远地生活在人民中间，和人民呼吸同样的空气，尝味同样的甘苦。……五年以来，所有作家的创作实践证明了，凡是遵照了毛主席指示的文艺方针的人，就会有成就，凡是在群众的生活里扎根较深的人，就能写出读者欢迎的作品。”

周立波发出如此感慨无疑是面对党和人民给予的信任，由衷地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此时的周立波无论是在革命工作还是在文学事业上刚刚斩获举世瞩目的成就。1948年周立波完成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上下两卷的创作。这是作家深入东北参与了两年的土改工作，在积累了一笔丰厚的素材之后，呕心沥血撰写而成。这部作品因具有生动和丰富的现实经验，因而一出版就得到广泛认可。《暴风骤雨》不但一度成为土改工作参考书用于指导各地土改实践，并且农民的语言、情感和诉求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引起社会各界的赞赏和共鸣。因而这部作品成为经典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力作，并于1951年度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将作家推向其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高峰。周立波在《〈暴风骤雨〉的写作经过》中将作品的成功归功于“讲话”精神对文艺工作的指导作用，“人民文艺工作者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修养，必须参加群众的火热的斗争，体验群众的丰富的生活，才能从事于创作”。新中国成立伊始，作家紧密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为响应全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他深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体验工人阶级的劳动生活，于1953年创作完成新中国第一部反映钢铁工业的鸿篇巨制《铁水奔流》。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后，就在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那年冬天，他选择回到家乡湖南益阳，扎根农村体验劳动。1957年底，创作完成《山乡巨变》。这一展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著作成为《暴风骤雨》的姊妹篇，表现党领导下的农村在取

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家不但延续了早期农村题材的写作经验，并且将不断深入生活后获得的越来越多的深刻思想一并融入作品当中。因而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这一时期的作品在思想境界和艺术手法上均有了超越时代的价值，成为作家的第二个创作高峰。

《山乡巨变》是继赵树理《三里湾》之后又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力作。两位作家因共同表现农村现实题材而形成“北赵南周”的格局。也许正是周立波全国人大代表的政治身份，也许是他一贯选择与人民同甘苦的立场，周立波把农民面对“入社”的复杂心理一一展现。

周立波传神塑造了好面子又贪图便宜的贫民“亭面糊”；不愿入社，精明而又自私的菊咬金；好逸恶劳、只为小家庭考虑的妇女张桂贞等一批光彩照人的农民形象，展现出农民在几千年小农经济影响下形成的狭隘思想，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的精神因素。而同时周立波又有精神寄托。在散发着茶花子香气的美丽单纯和善良的乡村，对这些落后思想需要给予善意的理解和同情。他将这一理想寄托在清溪乡支书李月辉这个“婆婆子”身上。李支书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不要看不起落后。……因为今天落后的，明天就可以进步。我们哪一个不是从落后来的呢？天生的革命家是没有的。”“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三条路走中间一条，最稳当了。”这显然是周立波深入实际作出的客观公允的分析，把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摆出来了。这种思想的流露展现出一个作家对现实高度的关怀和辩证思考，在当时极为难能可贵。

艺术上，作家开辟出有别于“山药蛋派”的农业合作化题材的书写风格。与《山乡巨变》同一时期创作的《禾场上》《山那边人家》《腊妹子》《张满贞》都因充满着浓厚的地域民俗、淳朴的乡土气息和细腻的人性关怀，展现出作家对乡土中国深沉的感情，让周立波的“人民立场”自成一个艺术体系并丰满了今天的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正是因为这一点周立波的

创作在新时期的文艺评论中成为被瞩目的焦点。

周立波在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重写文学史”浪潮中得到了“再认识”。他细腻恬淡平和的艺术风格，传神刻画人物典型性格，以及不刻意追求激烈矛盾的处理方法，让周立波被称为是“现代‘乡土文学’和当代‘农村题材’”之间的一个作家。因此，他得到比同时代作家更高的评价和更持久、深入的艺术关注。

现代“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知识分子作家群对农村痼疾和民族根性加以批判和启蒙的一类题材。乡土作家以鲁迅为代表，包括彭家煌、王鲁彦、许杰、许钦文、萧红、台静农、沈从文等。乡土文学承载着作家的思考或精神寄托。毫无疑问这两点在《山乡巨变》等作品中都得到了深刻体现。周立波能够有如此的艺术视野和艺术表现力，深刻表达人民甘苦，乃源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20世纪20年代末风华正茂的周立波跟随周扬来到上海接受新文学以及左翼思想的洗礼。30年代，他在加入“左联”后不久即成为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一员，长期从事文学和文艺理论著作的翻译工作，帮助他提升文学修养打下坚实基础。1942年周立波在延安接受了“讲话”精神，更加坚定地走上了工农兵创作的道路。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修养和革命战士般的坚定信念让他的作品在为时代代言的同时，更因散发着艺术的光芒而长久不衰。正像周扬在《怀念立波》的悼念文章中说的，周立波的作品不但“在各个历史阶段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步伐始终是和中國革命同一步调的”，而且“不缺少生动精致、引人入胜的描绘”。艺术和思想上的卓越贡献，归根结底在于周立波“首先是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然后才是一个作家”。周立波与人民始终同甘苦的精神在今天依然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两只天鹅一个人

□刘雅鸣

夜色中，周肿瞅个空，飞快地朝旁边的山道上跑去。湖边小径上的白天鹅忽然不见了他的踪影，有些急切又有些落地地往前追去，蹒跚独行好一段路，确定再也看不到他，这才无奈地走向湖边，再缓缓游向湖中。而冲上小山坡的周肿，此时，也正努力在微光中望向湖边，望着孤独的白天鹅。

这一幕，几乎每天都要在掠燕湖畔上演。

第一次看到这一幕，特别是白天鹅摇摆着微胖的身子走向暗黑的小径深处寻找周肿的情景，我几乎要掉下泪来，深情不过如此。真想对天鹅说，这不是生离死别，明天他还会来。

仅有的两只白天鹅，是美丽掠燕湖上风景中的风景。周肿，一个“80后”油画家。与白天鹅之间的这份奇缘，在周肿看来，也觉得不可思议：“我名字里的‘肿’字的意思就是大禽，也许冥冥之中，我与天鹅间有一种天定的缘分”。

三年了，每当傍晚时分，他都要来到掠燕湖看望这两只白天鹅，陪伴它们，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一见到他，不管多远，它们都以几乎飞奔的姿态朝着周肿游过来。上了岸，伸长脖子朝半蹲着的周肿的脸上、胸前亲昵地摩挲着，不时发出欢愉的叫声，似乎再说：“你怎么才来。”忽而又张开翅膀，欢快地扑棱起来。其中一只他走它走，他停它停，“神同步”，连姿态几乎都一模一样。每当此刻，人们都会惊呼着赶紧用手机拍下这难得的镜头。

想当然地以为，肯定是周肿经常

给它们喂好吃的，得到的答案是“并没有”。至于为什么这两只天鹅会如此待他，周肿也说不清楚。问他与天鹅之间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和情节，话不多，声音也不高的周肿淡淡地说：“没什么呀，就是这样，天天如此。”

作为掠燕湖的“明星”，两只白天鹅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欢愉。带点好吃的，逗弄它们，看它们伸展脖颈，看它们优雅地在水面上自如地随波游动，令人赏心悦目。这种喜爱，天鹅可以感受到。但是把它们当作消遣玩弄一番，或是并没有在心里对它们真在乎，它们一样可以感知到。

确实，有灵性的白天鹅最能知道谁对它们是真好，发自内心的好。今年春天北京难得多下了两场雨，乍暖还寒，周肿打着伞照旧来看他的老朋友。为了能多陪它们一会儿，还特意穿上了羽绒服。每次来，都必须等到天黑了，天鹅看不见了，他才能走。有人起哄：“你躲起来，看看天鹅会怎样？”周肿摇摇头。即使是这样的游戏，周肿都不愿意做，因为他知道天鹅会担心，会伤心。

“你对它们真好。”看着周肿望向天鹅那温柔的眼神，人们夸赞道。“不，是它们对我好。”周肿很坚决地回应道。

他拍黑天鹅“翻蛋”，两只白天鹅自动拉起一道警戒线，绝不允许外人打扰到它们，包括周肿的妈妈也不能靠近他半步。他围着湖边转圈，天鹅也就跟着在湖里转圈。常常，他会轻轻吹一声口哨，天鹅就像听到了最熟悉的音乐信号，立刻嘎嘎叫起来，积极回应。

天色已晚，人们都散去了，此

时，陪伴天鹅的只剩下了周肿。他并不做什么，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看着，一旁的天鹅也静静地或游在湖中，或上得岸来，不必紧张也不用恐慌，安心安宁。彼此守护，那种只有他们之间才能相通理解的默契，特别动人。

“一位独居的老人去世了，有几天天鹅飞到他们家。其中一只直接跳上床，趴到老人的胸口，一趴就是半天。后来才知道，这位老人以前救过它，神奇的是它们怎么就知道老人不在了呢。”这是周肿听到过的一个故事，他一直记在心里：“我还没画过天鹅，有机会一定会画。”

美丽的不只是风景，更是这人与生灵和谐相处的美好故事。掠燕湖，也因这两只天鹅，这个年轻的油画家，将长久地留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作者系河南日报总编辑）

